

7.5
3

杲向真 著

啊！不是幻影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个发生在六十到七十年代的悲喜交集的故事。她和他关山迢递，然而炽热的爱情之火在彼此心中燃烧不熄；另一个他，和她久别重逢，近在咫尺，却无法打开她的心扉，双方感情的距离犹如天各一方。

这里有对高尚情操的庄严的颂歌，也有对丑恶灵魂的犀利的剖析；有对现实生活的深沉的思考，也有对多种人物的独到的观察。作品给人以无穷的回味。

啊，不是幻影

杲 向 真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阴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8.75 插页 2 字数 188,000

1985 年 5 月第 1 版 198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71,000 册

书号：10100·808 定价：1.25 元

责任编辑 邵 平

这是一条极普通的小街，位置在城市的边沿，和城市中心的繁华区距离甚远。小街的东口，是一片田野，有一条柏油大路通向远方。大路是解放以后才铺起来的，到了一九七六年的夏天，路两边栽种的白杨和白杨之间的荆条，已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浓绿了。

民国以前，旧皇室的一个什么王府，就坐落在这条小街的东头。经过几百年的风云变幻，失去管理，金瓦红墙只剩下颓垣断壁。解放后，某军事机关在这片废墟上大兴土木，盖起了前后两幢整整齐齐的火柴盒式的三层筒子楼房，南面一幢临街的是宿舍楼，北边一幢是办公楼。两幢楼房的工程设计规模一样，都是南北两排十四平方米的单间房屋，两排房间当中，是一条宽窄合适的过道。解放初期盖起来的楼房大都是这样的。两幢楼房的大门，遥遥相对，中间是一片空地，大约有五十亩土地的面积。楼房的门外，沿墙都铺有一米宽的砖路。空地的宽度正是两幢楼房的长度，空地上设有篮球架、吊环、单杠和双杠。楼房和空地的外围，筑起了一人多高的灰色砖墙。大门开在西边，是朱漆铁皮大门，门外还有一座小巧的木板岗亭，有卫兵站岗。大门平时不开，行人都从旁边的耳门进出，只有汽车进出时才开大门。五十年代初期，这里的住户都是曾经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驰骋疆场，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人物，出出进进都沐浴在小街市民们尊敬和仰慕

的目光中。

小街的市民把这堵灰墙里面的楼房称作“官楼”，别看有个“官”字，这里却没有丝毫贬损和嘲讽的意思，只是表明这座院落是公家的房产，不是属于某个达官贵人的私宅；另一个意思是，这大院里住的不是一般的市民，而是对国家和人民有着重大贡献的公务人员。“官楼”的突起，给这条小街增添了不少光彩，小石子路铺上了柏油，理发店、邮电局、小吃馆、百货商店等等，也都开设起来了。下水道也经过一番疏通，暴雨天也不怕泥水漫进屋里来了。小街两旁还种上了槐树，每年夏秋之交，小街弥漫着槐花的香气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事物不断地起着变化，到了五十年代末期，军事机关迁走了。到了一九七六年，不到二十年，“官楼”先后又换了好几个单位。由于机关的变化和人事上的调动，临街的宿舍楼里的住户，有的搬迁到新建的单元楼房里去了，也有的离开了这座城市到别的地方去了。空地上的运动器械，捐给了附近新办的中学校。特别大的变化，是从一九六六年起，这座“官楼”大院，显得冷落而杂乱了。小柏油路上来往的汽车少了，大院的红漆大门，颜色旧了，有的地方脱了漆，露出了铁锈的斑痕。门外的木板岗亭，成了街道上儿童们捉迷藏的藏身地方。砖墙外侧壁上，本来是小学生用粉笔涂抹的许多字迹歪扭的标语：人民公社好！大跃进万岁！……还有用粉笔画的一些小人、军舰、坦克……这些五十年代留下的笔迹模糊了，六十年代末期又添上了一些新的笔迹，大都是小同学之间相骂的话，诸如“砸烂×××的狗头”、“××的爸爸是走资派”，也有骂学校老师的，如“×老师是个大黑帮”、“×老师是风子休”（把“封资修”写成了“风子休”），等等。

七十年代中期，这座院落里的办公楼分给了一个文化事业单位，临街的宿舍楼也由房产管理所接收，成了居民楼了。“官楼”的名称也变成了“一号大院”，因为它处在小街东头第一家，门牌是一号。原“官楼”里的老住户，也只剩下了孙大山、赵有年和李奶奶三家了。这时候，人都变得聪明机警起来，不是至亲密友，互相之间从来不来往，不说一句话，虽然住在一幢楼里，也都如同陌生的路人一般。孙大山、赵有年、李奶奶三家，是一道从战火中闯过来的老战友，又都是同年同月同日搬进来的老住户，很自然的就更加亲密起来。

孙大山和养子孙虎住在楼下北面一排的第一间屋子里。孙大山五十八岁，抗日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里当过班长，解放战争中升了副连长。他在战斗中是个猛冲猛打的角色，多次立过战功。解放石家庄一役，为了保护师长，左腿伤了筋骨，由于治疗不及时，落下了残疾，走起路来有点瘸，特别是阴天，伤处钻心的疼。全国解放后，孙大山留在师长家里做些杂务活，和师长一家住在这所“官楼”里。孙大山原是个穷苦的羊倌出身，没上过学，参加八路军后，在部队里进了扫盲学习班，能读书看报了。五十年代末期，师长因为工作需要调走时，全家也跟着离开了这座“官楼”。孙大山觉着自己腿脚不灵便，没有跟去，做为师长的家属留居在这里，由师长供给他生活费。孙大山闲着闷得慌，就主动地把两幢楼房中间那块空地看管起来了。直到房管所接收了宿舍大楼，才把孙大山也收留下来，由公家开给工资，把管理空地的任务正式派给了他。孙大山很乐意接受这个安排，他原是从农村出来的，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从他留下来看管这块空地的时候起，他就把自己当成了一名园艺工人。

孙大山对种植的事不是外行，他又肯钻研，常到书店去翻看一些园艺学方面的书籍，也肯花钱买书。他跑遍了市里各大公园去观摩和求教，每天晚上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园艺书籍，把他喜好的半导体收音机——那是师长送给他的纪念品——也搁置在一边了。

孙大山研究的是园艺学，在地里种的却是粮食。困难时期，五十亩地的玉米，使“官楼”大院的机关和住户免除了口粮的紧张感。大院的人一说起那困苦年月，都对孙大山赞叹不已。并不是孙大山有什么预见，他不过是觉得对园艺还不太有把握，得先学习园艺书籍，在这时候先种上玉米，才不亏待土地；没想到玉米和“饥荒”撞了车，把“饥荒”撞翻了。三年之后，国家经济形势好转，饥荒感过去了，孙大山开始试着用他学到的园艺学了。他不声不响，跛着脚在园子里走来走去，从房前屋后的犄角旮旯里搬来废砖碎石，不几天，空地中间出现了一个好看的圆形花坛；他又扛着锄头，从小街东口的野地里挖来一些小树苗，用小树苗在园子里隔成几条小路，在花畦里撒下了种子，还在小路的两边用石块垒了几个坐凳。不到两年的工夫，就把这块空地侍弄得有模有样，象个美丽的小花园了。当孙大山看着办公楼里的工作人员休息时到花园里来散步，有的还坐在他垒起的坐凳上接待来访的人，那黑红的脸上漾起了快活的笑纹。

孙大山没有结过婚，他觉得老婆是个累赘，一个人自由自在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。师长曾经给他物色过一个合适的对象，劝他结婚，孙大山谢绝了。心想，干吗找个磨盘套在脖子上，自讨苦吃。师长一家走后，孙大山和师长虽然还不断有来有往，但是究竟和住在一个楼里不一样了。有时候也觉着一

个人怪寂寞，就从山区农村远房亲戚家领来一个没有父母的三岁小男孩，收为养子，取名孙虎；一九六四年孙虎七岁，就送他进了小学。孙大山十分疼爱他的养子，他在园子里干活，有时干着干着就对花木说起话来，“快快长，长得壮壮实实、漂漂亮亮的。”这时他心里想着的是虎子。孙大山给花木浇水时，听见泥土吱吱吸水的响声，口里常说：“喝吧，喝吧，水有的是，喝饱了算。”而这时他心里想的是虎子在学校里有水喝吗？

孙虎九岁正要升入三年级那年，社会上忽然起了动乱，整个国家陷入骚动之中。学校停课了，机关停止工作了，有些工厂停产了，一些建立过丰功伟绩的开国元勋被抓起来了，“黑帮”、“牛鬼蛇神”等等恶言恶语的诅咒声象瘟疫一样传播开来。公园里好看的花木成了必须铲除的“封资修”毒草了……房管所的人通知孙大山立即毁掉园子里的花木，改种粮食和蔬菜。当时正是繁花盛开的夏季，决定毁园的头天夜里，孙大山和儿子在园子里人字形的窝棚里住了一夜。孙大山相信花木也有精灵，心诚的人能在夜里听见花木谈心。想到明天他将要亲手毁掉自己精心培育起来的花木，这简直是罪过，他心疼。

儿子喜欢听故事，特别喜欢听打仗的故事。孙大山却更喜欢给儿子讲自己的童年，讲放羊的故事。



“那些羊听你的话吗？爸爸。”儿子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问。

“听，听。叫它们往东，它们就不敢往西。放羊都在大山里……”

孙大山说到这里，儿子急忙问：

“大山里有狼吧？”

“有。”

“也有老虎吧？”

“有。一次遇到暴风雨，我们在山洞里躲到天黑，回不去了，就在山洞里过夜。半夜，狼来了，好家伙，不止一只……”

虎子把身子向父亲身边挪了挪，屏住呼吸，一声不响。孙大山接着说：

“我早有了准备，把一根树枝点着了火，在洞口划着圈，把狼都吓跑了。”

“你不怕吗？那会儿。”

“心里也怕，可是到那时更要紧的是想法对付它，要想战胜它，勇气就来了。”

“我也是，爸爸。”

儿子的话没头没脑，孙大山听不明白，问道：

“你也是？是什么？”

“算算术呀，默写生字词呀，我一想到应该——战胜它，我就来劲儿了。”

“好儿子，就要这样，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想法子战胜它。”

父亲的夸赞使虎子十分高兴，他搂紧了爸爸的脖子，牢记住爸爸的话，把头埋在爸爸的胸前睡着了。

孙大山用手轻轻地在儿子的头上抚摩着，一面凝神静待

着谛听花木的谈话。

空地上又改种了庄稼。孙大山干一行爱一行，只怕闲着没事干。他辛辛苦苦种下的玉米、茄子、黄瓜、豆角、西红柿，总是不到成熟，就被大院的人“各取所需”，摘走了。一九六九年，干部被赶到农村插队的插队，住干校的住干校，大院里的人走了一多半，孙大山被留下来仍旧看管这块空地。所有的收获，明里规定给机关留守处的人，但是宿舍楼里剩下的家属，也从来不放过机会顺手掰几个嫩玉米棒子，摘个把茄子、西红柿，或扯下两条黄瓜。孙大山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看不见。学校停了课，他得闲就亲自教儿子的功课，和儿子一道查字典，练算术习题。到了一九七〇年孙虎按年头计算，上了初中一年级。幸亏孙虎在家里和爸爸一道学完了全部小学的课程，他在班上的成绩是突出的。到一九七五年，国家的形势有了起色，各条战线都在整顿，下放的干部陆续回来了，大院办公楼的文化单位也恢复了业务。这时孙虎从高中毕了业，这个文化单位的干部挺喜欢孙虎，单位的领导也喜欢这个聪明伶俐、人品也很好的小伙子，加上孙大山的为人可靠，这个单位就把孙虎收来培训他当三轮摩托车司机，专管送送公文、纸张、印刷品。孙虎也很喜欢这个工作，活不重，他得空就悄悄地向人借几本“扫四旧”时“打埋伏”保护下来的书，很得人喜爱。

孙大山依旧不声不响地管理那块空地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他是只管耕种，不问收获。

常到庄稼地里来遛弯儿的，是住在二楼的赵有年，一个自命不凡的中年人。他身材魁梧，仪表堂堂，言谈举止俨然一副大干部的派头。虽然年过半百，由于保养得好，满头黑发，皮

肤还象二十岁的少女一样鲜嫩。赵有年年轻时在农村做过小学教师，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八路军，在师部的文工团里担任剧务工作，和孙大山在一个师部里。全国解放初期，赵有年在这个军事机关担任总务处的一个科长，五十年代末期这个军事机关从小街迁走的时候，赵有年已经被提升为总务处副处长了。这时赵有年声称自己有胃病，肝脏也不好，还从医院弄来了一张证明，就转业到地方，在“官楼”附近的一家服装公司当了副经理。他不懂业务，可是他能弄到医院开的病假证明，不常去公司上班。

赵有年闲居无事，和小街的菜站、商店、邮电局、储蓄所等单位里的人混得挺熟，他愿意让人们觉得他是一个资格老、级别不低而又和蔼可亲、平易近人的老干部。他和孙大山不同。战争年代他带文工团下连队演出时，和孙大山有过几次接触，那时他就讥笑孙大山老实本分；将近十年的总务工作，使他的交往面相当广，办事的路子很宽，当“后门”逐渐变成解决问题的重要渠道以后，他的能量就表现出来了。谁的儿子要上小学，还差几个月不到年龄，赵有年能给解决；谁家的儿子娶媳妇要买一辆自行车，赵有年能给买到；谁家的亲戚想从遥远的小县调到这城市里来，或办理“病退”回城，赵有年也能疏通人事部门，联系好接受单位，等等。由于多年没做什么工作，十年动乱中，他没有受到冲击，又由于广结善缘，使他的日子过得相当太平安适。甚至在六十年代末期干部下放的年头，他也靠了“老病号”的招牌躲过去了。小街上认识赵有年的人，都说他是一个有福的人。

赵有年唯一的不幸，是他的妻子在六十年代初因病去世。她只留下了一个五岁的女儿赵娜。十几年来，赵有年又

当父亲又当母亲，对女儿十分宠爱。如今赵娜也十九岁了，细高的个儿，长得象父亲，只是苗条一些；面容却秉承了父亲和母亲的优点，俊秀非凡。她性格开朗，略带些偏激和执拗，很象死去的母亲。她那紧压在黛色长眉下的一双明亮的眼睛，时时闪耀着对人生探索、追求和渴望的光焰，使见到她的人都惊叹她的美丽而不由得多看她几眼。赵有年有了这个女儿，感到非常称心。他无论在经济上、政治上，条件都比一般人优越，女儿在家庭里自然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。在学校上学时，她的穿着就显然与众不同，总是最好的料子，最新的样式。

赵娜和孙虎从上小学起，就是同班又同桌，来去都是一道。上高中以后，赵娜和孙虎仍然是同桌。中学恢复招生那阵，高中也是普及教育，凡是合乎年龄标准的，都得入学，不管成绩好坏，都得跟着升班，连停课的那几年，也算在学龄里面。名义上是高中，实际上大多数的学生也就只有小学低年级的水平。老师可不管这些，按课程教学，而且教得很认真，于是考起试来，总有绝大部分的学生不及格。赵娜靠着孙虎的“帮助”——照抄他的考卷，总算勉强及格。升到高中二年级，也就是要毕业的那年，有一天早上，孙虎和赵娜一同去学校，走过理发店的门口，孙虎听到路旁有人议论他们，称赞他们是“很好的一对”。孙虎顿时就红了脸，他偷看了一眼身旁的赵娜，知道她也听见了，因为她也正看着他，并且向他甜蜜地一笑。孙虎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。

“你先走吧，我，我要回去拿东西。”孙虎站住说。

“拿什么？”赵娜也站住了，怀疑地看着他。

孙虎不会说谎，一时编不出回去拿什么，显得很慌乱，脸更红了。

“拿什么，我和你一道回去拿。”赵娜很坚决。

“不行，你先走吧，我回去拿，拿钢笔。”

赵娜笑了，她笑声朗朗，更加引起了小街上人们的注意。

“瞧你，”她笑着说，“你衣袋里不是插着钢笔吗。”

“不不，你管不着，你走你的。”

孙虎很气恼，不等赵娜开口就转身往回走，没走多远，就悄悄地拐进了另一条通向学校的小路。为此，赵娜生孙虎的气，有好些日子不理孙虎。从此，孙虎也不再和赵娜一道去学校了。

自从孙虎当了三轮摩托司机，赵娜表面上瞧不起他的工作，但是内心里却不由得喜欢起三轮摩托车来，在路上碰见三轮摩托车，她总是很礼貌地给车子让路，而且目光追随着车后，直到看不见为止。她觉得三轮摩托车又轻巧又灵活，跑起来和大汽车一样飞快，很羡慕孙虎。她听说三轮摩托车不容易出车祸，想到孙虎不会出什么危险……她又放下了为孙虎的安全暗暗悬起来的一颗心。

赵娜高中毕业后一直待在家里。她的同学们大多去农村插队，一个个都走了，她是独生女，得到照顾，没有去农村。赵娜在家里待腻了，也想申请到农村去，她征求父亲的意见时，赵有年说：“插队？独生子女有照顾，不去插队；再说，那农活又脏又累，好好在家待着等机会，难道爸爸养不活你了？”爸爸说了一大套不去的理由。赵娜自己对农村生活也有体会，她几次随班级去农村“学农”，单说那厕所，啊呀呀，席障子四处露缝不说，就那满地的屎尿，蛆虫到处爬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……她决定不再提去农村插队的事了。街道办事处安置办公室介绍她去服务行业工作，她又动了心，但是父亲不赞成。

一个干部的子女抛头露面去站柜台？去称黄瓜茄子大白菜？去当理发员、女招待？不行！最后，安置办公室的人直截了当地对她说：“你自己找到合适的工作，我们给你把关系转过去就是了。你爸爸还怕不能替你找到门路？”

说这话的人，是把问题看简单了。不错，赵有年关系多，路子广，可是，象给赵娜选个好单位、好工种的大事，早不是靠一般的关系、人情就可以敲开“后门”的了。赵有年恰恰就是把这方面的希望寄托在一般关系上，结果就应了年轻人常说的一句话：“没门儿”。赵有年不是没有经济实力。他有好几份储蓄存折，分藏在不引人注意的笔记本的塑料面里层，就是买点厚礼，也不困难。但是赵有年偏偏在银钱上抠得很紧。原来五十年代的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，赵有年是亲身经历过来的，这里边的份量，他有体会，他一直不请客，不送礼，努力表现出一个奉公守法、不徇私舞弊的干部的作风。另一方面，赵有年也确有自己的生活计算。别看他每天吃银耳、当归一类补品，平常过日子却很节约，节约到近乎吝啬，家里连扫地的笤帚、簸箕都舍不得买，一个使用了多年的簸箕，底子生锈裂了许多缝，象个破筛子，倒垃圾时，一路从二楼上筛下来，弄得楼道上洒下不少纸屑尘土。孙大山说了他几次，他便向三楼李奶奶家借簸箕使用，用完也不马上送还；李奶奶要用时，只得叫孙女去讨回来。赵有年没有请客送礼，女儿的工作就迟迟不得解决。赵娜每天在家闲着没事，就一天无数次地换衣服，对着镜子把头发变着花样地梳来梳去。

赵有年每天清早要到园子里锻炼身体，散散步，划两下太极拳，吸吸新鲜空气，一面察看察看园子里的作物，顺手摘下他相中的黄瓜、茄子之类。一次，李奶奶的孙女小菜，从厕所

的窗口看见赵有年摘了几条黄瓜，回家对奶奶说赵爷爷又偷黄瓜了，还说“不信你快去看”。奶奶责备小荣说：“不许这样说赵爷爷，那地里的作物谁不去糟践，咱可别眼馋，听见没有？”

大院子里，只有李奶奶不到园子里去摘东西，也教育孙女小荣不要去摘。李奶奶是农村长大的，懂得种庄稼做园子的辛苦。她看见作物还没有成熟就被人摘了去，觉得心疼，这是孙大山老汉用汗水和心血浇灌的啊！李奶奶老家在山东靠海的一个渔村，父母生下她姐妹三人，她是老大，小名香妮。她从小跟着父亲出海打鱼，家里把她当个男孩子使唤。她身段壮实，水性极好，人又灵巧，长到十几岁时，就顶得上个大小伙子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她参加了共产党，当了村里的妇女主任。村里的人提起香妮来没有不佩服的。她的丈夫是师部的炊事员，全国解放后，随着这个军事机关进了大院，住在三楼尽西头过道南边的房间里，仍旧干着炊事员的工作。李奶奶的丈夫几次去信叫她出来，她都说家里走不开，直到一九五五年儿子考上了这个城市的大学，她才带着儿子离开老家奔老伴儿来了。机关搬迁时，老伴儿随师长走了，李奶奶因为儿子还在大学里读书，她自己也在街道上做点工作，就没有随老伴儿走。反正还住在一个城市里，什么时候都可以见面。李奶奶的儿子大学毕业以后，在科研单位工作，和同事中的一个姑娘结了婚。一九六六年媳妇生下了小荣。小荣三岁时，爸爸妈妈都进了五七干校，小荣留给了奶奶。到了七十年代中期，小荣也十岁了。

李奶奶也五十八岁了，还很精明能干。她是从小在苦水里泡大的，又受过多年革命的锻炼，虽然识字不多，却也明白

道理。她关心国家大事，每天工作再忙再累，也不放过听收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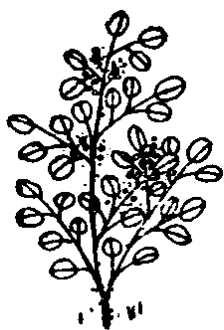


机里的新闻报道。她的小半导体收音机是儿子自己做的，听新闻时，李奶奶也从中享受到一种亲子的温暖。她不让小荣动她的收音机，只让小荣听“小喇叭”和对少年儿童广播。其实，小荣也并不真的要听什么，京剧“样板戏”她听不懂，“评法批儒”她更不明白，只不过她觉得那小匣子很好玩。有一次她拿起半导体，刚刚转动了开关的小钮，就被奶奶夺了过去，关上开关，搁在桌上用手

帕盖好。奶奶还责备小荣说：“对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你动一下，它缩短一天寿命，我还要留着它送终呢！”那时小荣还只有五六岁，不明白奶奶说的话，只知道奶奶不让她动那个小匣子，那是奶奶的宝贝，奶奶非常珍爱它。

李奶奶在街道上，负责专管这个大院。组织家属学习，检查环境卫生，宣传防火防盗，都是她的事。不知是李奶奶的人缘好呢，还是在那个动乱的年月，人人都变得顺从起来，到了学习的日子，或是“上面”有什么需要“家喻户晓”的文件发下来，李奶奶只要站在楼下叫一声“开会学习啦！”不一会儿，就有人磨磨蹭蹭地搬着小板凳来坐在大树下集中了，每次必到的，有十来个人，大都是些老太太。有的带着针线活儿，有的

抱着孩子。赵有年和孙大山也逢会必到，因为李奶奶把读报纸念文件的任务交给了他俩，他们自己也想了解了解形势和所谓新精神。念的人只管念，听的人该做什么只管做什么，纳鞋底线绳哧哧的拉锯声，婴儿肆无忌惮的啼哭声，在搓板上洗衣服的唰唰声，为嗡嗡的读报声进行伴奏。李奶奶也不要求大家讨论，念完了了事，学习算是结束。倒是老太太们有一股惰性，坐下了就不想起身，学习完了都还不散，而在一起聊起天来了。这个说谁谁的儿子“清明”那天晚上被逮走了；那个说某某的老婆也被拘捕了，还怀着四五个月的身孕呢……每逢这时，李奶奶就装做什么也没有听见，早早地走开了。只有个别和赵有年或孙大山见面时，她才打听这些，和他们一起议论几句。赵有年和孙大山对时局也摸不清底细，一个只知道攒钱把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，一个整天勤勤恳恳地劳动。李奶奶有时去看丈夫，从丈夫那儿听来一星半点的小道消息，也都是没头没脑、不着边际、不可以随便乱说的，只能和赵有年、孙大山一块悄悄地议论议论。因此李奶奶、赵有年、孙大山这幢楼里的三家老住户，自然地就形成了一个互相依靠互相关心的小集体。



二

一九七六年七月下旬，天气一直处在不晴不雨的胶着状态中。太阳一直隐匿在灰白色的云层里，却把大地烘烤得灼热窒闷；空气象凝固了似的，没有一丝儿风，小街两旁的槐树叶子也有些萎黄了。

这天下午，赵有年拿着一盒针药，沿着小街路边树荫下面向“红医站”——卫生站——走去，一面不断地向小街两旁店铺里的人打招呼。赵有年下身穿着一条旧的浅灰色派力司长裤，上身穿着白涤纶长袖衬衫，也是穿旧了的。但是这穿旧了的衣服却更加衬托出赵有年自身的不凡气度。赵有年知道，他完全用不着靠衣着打扮自己，他觉得自己无论穿着什么衣服，都无损于他的堂堂仪表和洒脱的风度。

“红医站”在小街的东段路北，离一号大院“官楼”不远。赵有年远远地看见“红医站”的门没有上锁，那就是说岳军大夫在家。赵有年用手掸了掸衣服的前襟，把粘在胸前的一根黑发掸掉了。他想，才五十四岁就开始落发，过早了。他出门之前曾照过镜子，对自己红润丰满的脸颊颇为满意，唯一使他遗憾的，是那双该死的眼睛，竟象一双死鱼的眼睛，没有一点神采，这无法弥补的缺陷使他很伤心。

一个老妇人蹲在“红医站”隔壁的门口，在一个瓦盆里洗一条污黑的毛巾，她满脸皱纹，几根稀疏的白发在脑后挽了一个核桃般大小的发髻，她抬起头对赵有年咧着嘴笑了笑，露出没有牙齿的黑洞洞的口腔，表示向赵有年问好。赵有年一